

變遷的中國

CHANGES CHINA

潘強恩
劉純彬
著

变迁的中国

潘强恩 刘纯彬 著

西藏人民出版社

变迁的中国

作者: 潘强恩 刘纯彬

责任编辑: 杨芳萍

封面题字: 刘国庆

出版发行: 西藏人民出版社

印刷: 廊坊人民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字数: 250 千字

印张: 11

印数: 01—5000 册

版次: 1999 年 1 月 第一版 1999 年 2 月 第 1 次印刷

ISBN7—223—01127—0

定价: 18.00 元

自序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中国从明末清初时已开始落后于西方国家,因那时西方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已兴起,而中国仍循着封建老路走。只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尚未强大到直接侵略中国的地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尚未强烈地提出开拓海外商品市场的地步,这才有所谓大清帝国的百年威风。到了晚清,人家扛着洋枪洋炮乘着钢铁军舰不远万里打上门来,人家的市场经济商品经济也毫不费力地把我们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打的一败涂地。在这样一种严重局面下,中国人的杰出分子,开始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办法。孙中山是代表人物。洪秀全并不能说是代表人物。关键的核心问题在于工业化,落后挨打首先是因为工业化,要使国家强大起来也要靠工业化。四个现代化可以浓缩为工业化。当然,工业化需要科学和教育。并且,只有需求才能拉动发展。从洋务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经过多少志士仁人的不懈努力,中国的工业化总算有了一个初步的但十分可怜的基础。

1949年以后,中国才有可能在和平的环境里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遗憾的是从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间,我们有太多的失误。首先是指导思想的失误,其次是制度和政策的失误。从1979年至今的20年间,指导思想基本搞对了,比较实事求是了。但制度的探索、创新、确立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历史这程。本书分为历史篇和制度篇,前者是讨论指导

思想,后者则是讨论制度创新。作者认为:中国最缺的不是资金不是人才而是好的制度。没有好的制度,即使有资金也会浪费掉,即使有人才也会埋没掉。反之,资金会发挥最大的效益,人才会发挥最大的能力。

几千年的古老中国,变迁力度最大的世纪当数即将过去的20世纪。而20世纪的下半叶比起上半叶,虽然脚步走得也很坎坷艰难,但成就进步还是比上半叶要大得多。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基本是在战争中渡过的,其中大部分时间还是内战,不断的战争把不断的积累起来的一点工业化财富耗费光,中国的工业化也就难以完成原始资本积累。20世纪下半叶,前30年虽然对农民剥夺狠了一点,但终归共产党有能力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完成了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

现实的中国是从历史的中国变迁而来,未来的中国是现实的中国继续变迁的结果。在这个变迁的过程中,中国农村的变迁最剧烈。中国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在整个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全局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工业化城市化是一件事物的两个侧面,城市化是工业化的载体,同时又对工业化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城市化如果滞后,则会对工业化产生阻碍作用。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带来了原本种粮的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和转移。带来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方面面的发展和进步。由此,整个中国的面貌都改观了。

展望21世纪,只要我们积极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充分利用知识经济提供的成果改造传统产业,大幅度加快工业现代化进程。未来的中国一定是一个强大富裕的中国,一个文明健康的中国,一个任何外国人也就不敢小瞧的中国,一个扬眉吐气的中国,一个真正站起来的中国。

本书的历史篇除作者的思考外,还受益于一些同志的著述,特别是薄一波和李锐。制度篇所引资料出处已全部在书中注明。

作者
1999 年元月

目录

上卷 历史篇

自序	(1)
第一章 中国工业化的历史经验	(2)
第二章 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历史经验	(20)
第三章 再谈亿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往哪里去:10年来 我们关于农村劳动力的调查研究结果	(32)
第四章 再谈亿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往哪里去:近半个 世纪以来的思想与政策	(51)
第五章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农业机械化的根本出路呢?	(75)
第六章 再谈我们的粮食观	(87)
第七章 一篇最有道理的文章和一篇最没道理的文章	(117)
第八章 中国工业化与农业曲折发展的根源之一:斯大 林与布哈林	(126)

下卷 制度篇

第一章	户籍制度	(135)
第二章	粮食制度	(153)
第三章	住房制度	(167)
第四章	就业制度	(186)
第五章	教育制度	(211)
第六章	失业保障制度	(217)
第七章	医疗制度	(230)
第八章	养老保障制度	(252)
第九章	人才制度	(261)
第十章	婚姻制度	(273)
第十一章	生育制度	(280)

上卷 历史篇

第一章

中国工业化的历史经验

中国工业化的发端,不是如某些学者所说,始自 1840 年的鸦片战争,而是始自 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过去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多数人认为它是清政府奉行对外投降对内镇压政策的产物,是清政府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买办化的当权派,勾结国际侵略势力,镇压国内人民革命,挽救封建统治的一种自救运动。特别是认为,中日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我们认为,洋务运动的主流应当肯定,它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是生产力的促进派不是促退派,其代表人物是当时的革新派不是保守派。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形成,科学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甚至成批留学生的派遣以及近代军事工业的建立,都是洋务运动奠定的基础。特别是交通运输、采矿冶炼、邮电通讯以及纺织等产业领域建树颇多。如在交通运输业方面,1872 年搞的招商局,至今在海内外影响巨大;邮电通讯方面 1880 年建立的天津电话电报总局;1880 年建造的第一条津榆(山西榆次)铁路;1877 年设立的开平煤矿;1890 年创建的上海机器织布局 and 河北织布局以及同年建立的汉阳铁厂,等等。当然,历史的局限性在洋务运动中也表现的十分典型,不但主要决策者而且主要管理者均是政府官僚,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营私舞弊挥霍浪费尤其普遍。以史照今,100 多年过去了,那时的官办企业所带来的种种封建痕迹和弊病,仍可在现时的某些国营企业中得到变相的影子。这使我们警醒到,现实某些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长期亏损,经营不善,原因不能完全归到计划经济体制,而具有更深刻的历史承接性。特别是一些管理者的心态和意识,不是现代的,而是带有一定成度的封建保守性。推而广之,不仅在企业界而且在其他领域也存在这种现象。但不管怎么说,洋务运动中的企业虽然采取官督商

办形式为主,或采取官办或官商合办等形式。他们从事的是商品生产,参加市场流通,谋取利润,并且私人资本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因此是准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而先这些民用企业一步,洋务运动首先办起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企业,由清政府财政提供资金,企业不计盈亏,也不进行企业内部积累,企业的发展或收缩不决定于自身的能力,而决定于财政拨款的多少。产品不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交换,而是全部由政府收购装备军队。洋务运动中这批企业的兴办,虽然奠定了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基础,但还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使人不能不回味的是,这种企业模式,竟似可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的国营企业身上得到影子。

我们肯定洋务运动及其代表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在中国工业化历史进程中的进步作用。是相对于当时清政府中一批主张闭关锁国、重农抑工商的代表人物而言。他们那种主张的结果是扼杀资本主义的萌芽,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窒息思想文化的交流。当时的大清重臣甚至愚蠢到有“天朝不宝远物”之说,连西洋人传来的地图、历法、地球仪、火枪、船模、望远镜、钟表、玻璃只当作好玩的贡品。而极力主张闭关的代表人物琦善家里却藏有外币 1000 万元,其洋化程度远超过和珅。而不论守旧派也好革新派也好,其腐败又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洋务运动时,中国所有军工、民用和私营企业的资本总额只有白银 2000 多万两,而李鸿章一家的资产高达 4000 多万两。这些资金不肯用于工商投资,而只是购置田产、挥霍享受,或窖藏起来。而比较起来,李鸿章时代的腐败还远不如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的军阀。

洋务运动起步的工业化进程是十分缓慢的,其间更加之中日甲午海战的失败以及其他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大量

白银以赔款方式流出国门。工业化起步所需的资金更加薄弱。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100 年间中国被迫与外国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达 1000 多个。割地 100 多万平方公里,总计赔款达 19 亿 5 千 3 百万银元,相当于清政府 1901 年全国财政收入的 16 倍,1901 年全国工矿企业总产值的 82 倍,被疯狂掠夺的资源财物还未计算在内,战争造成的损失亦未计算在内。另外,抗日战争损失 600 亿美元,而新中国成立后的“文革”运动损失人民币 6000 亿元。按当时比价率,大约 3000 亿美元。无数被毁坏的名胜古迹尚不计算在内。而抗日战争时的 600 亿美元估计至少与现在的 6000 亿美元等值。而“文革”时损失的 6000 亿人民币,则应与现时的 60,000 亿人民币购买力等值。不久前,完成的国有资产普查,总量为 5 万多亿人民币。民间储蓄 3 万多亿人民币。

从洋务运动的兴起到辛亥革命爆发,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国人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欺辱下,在封建专制的统治下,开始了近代工业化的进程。其局限性是明显的,其进步作用也是明显的,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朝廷,随后的几次复辟虽未成功,但军阀混战从此开始一直到抗日战争。在这 20 年中,仅四川一省的战乱就达 400 次之多,广东、山东、陕西、贵州等省也大战不休。这 20 年大内战惨不堪言,导致经济、政治、社会混乱到极点。人力、物力、财力耗尽,国家的基础已近一无所有。就是在这艰难恶劣的环境中,中国的近代民族工业仍在缓慢发展。

抗日战争使一盘散沙的中国人第一次空前的大团结、大凝聚。中国东部工业的一部分迁至重庆等西南部后方,并转向战时体制。由于战争的掠夺和影响,发展几近停滞。抗日战争和四年空前规模的解放战争结束后,当时中国的工业经

济已经崩溃。

新中国的建立为在和平的环境中展开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提供了可能,3年国民经济恢复顺利完成,苏联援助的156项工业大项目的实施,为新中国工业化进程开了好局。但是,随后进行的“三大改造”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却不能认为是成功的。关于这个问题,1981年1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这样结论的:“1952年,党中央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一、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和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国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国家需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一定的发展,但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也必然出现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这就不能不发生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在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的各项经济政策之间,在它们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在它们和本企业职工、全国各族人民之间,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打击投机倒把、调整和改组工商业、进行“五反”运动、工人监督生产、粮棉统购统销等一系列必要的措施和步骤。必然地把原来落后、混乱、畸形发展、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引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三、我国个体农民,特别是土地改革中新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农下中农,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和出卖土地,产生两极分化,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抗御

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对农产品的需要日益增大,一方面对农业技术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强,这也是促进个体农业向合作化方向发展的一个动力。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我们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于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在改造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到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我们认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提法并不准确并不科学,这个提法的前半部分指出了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正确的。但工业化的目标

应当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党和全国人民努力奋斗的方向，而不仅仅是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个提法的后半部分是生产关系性质的，而这个提法的前半部分是生产力性质的。问题还在于，工业化的目标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什么关系？假如设想，这个改造推迟 50 年进行，是否会影响并且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家工业化进程？这种影响肯定是负面的吗？如处理得当，有没有可能产生正面影响？从而成为实现国家工业化目标的促进力量。“三大改造”开始前，国营工业的产值比重已达 70%，而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产值仅占 30%，应当说，这个份量并不影响国家工业化推进，并且会成为国营经济的有益补充。并且主动权也就是国家经济命脉掌握在党和政府手里，完全可以使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速度维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上。事实上，“三大改造”不是推迟了 50 年而是提前了至少 50 年实施，“赎买”的原则是对的，但具体方式方法却不尽妥当。其后果之一是把百余年积累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几乎全部“消灭”掉了。这种影响至今仍在，目前我国企业最致命的弱点是经营管理人才数量少，素质低。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的素质是有延续性的。薄一波同志认为：对一部分后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党中央明确宣布：公私合营之后，对原企业双方在职人员实行包下来给以安排的方针。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陈云同志 1956 年 7 月 21 日讲过：从中央到地方，业务部门的普遍缺点是：开专业会议时大体上只找本系统的干部，不找资本家，认为资本家是“包袱”。“和资本家离得远远的，采取隔离办法来避免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据国务院四办 1956 年 8 月间召开的一次会议反映，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公私双方人员能够明确分工，做到私方人员有职有

权,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从生产实践中得到改造而显有成效的是少数;公私共同关系很不好的,也是极个别的现象;绝大多数的工厂,公私双方人员是表面上相敬如宾,实际上貌合神离,关系不够正常。私方人员普遍感到有职无权,说是:“职位好定权难定,守职容易尽责难。”也有的说:“安排私方人员是聋子的耳朵,兔子的尾巴。”公方代表则感到:和资本家相处,“左”了违反统战政策,右了丧失阶级立场,因此在工作中大都谨小慎微,宁“左”勿右,不敢接近私方人员,不敢放手使用他们。少数公方代表态度生硬,缺乏协商精神,认为和私方人员商量不出什么名堂,分红也负不了责。对私方人员的合理建议也往往是置之不理。私方人员中,尤其是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中,有不少能干的人,他们有较丰富的经营管理知识和本领。对他们弃置不用,对发展经济和改善经营管理来说,都是一个损失。

对 50 年代的三大改造,本书尚不能展开周到全面的分析研究。这是一资生产关系的大调整。仅就工业的改造说,几乎把原有全部经营管理人员搞掉了。当然他们中一部分是资本家。这是工业化进程中最宝贵的财富。公私合营的工厂,负责的主要管理人员全是公方代表,而他们没有什么经营管理知识和本领,后来又进入计划经济体制。再后来又由于把工厂企业管理人员党政干部化,中国的工厂经营管理的能力就更差了。在许多年里,一些工厂的管理在不是兢兢业业的企业家,而是当官做老爷,比资本家还厉害。改革十几年以后的今天,大批国营企业管理之差,之不负责任仍然比比皆是。因此,大批企业亏损,大批企业存在严重的浪费和跑冒滴漏,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到本世纪 50 年代,中国近代工业化曲曲折折坎坎坷坷艰难的走了百年的历程,才积累培育起来